

[編者按]2013年9月22—23日，由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浙江大學歷史系共同主辦的“‘什麼是最好的歷史學’西湖論壇”在中國杭州市西子湖畔成功舉辦。為了讓更多的歷史學愛好者瞭解此次論壇所取得的成果，直觀呈現不同地區、不同研究方向、不同代際學者之間的思想碰撞和切磋交流，經主辦方同意，本刊特選取其中五篇文章的觀點精華擇要發表，以推動歷史研究的不斷進步。

## 什麼是最好的歷史學（專題討論）

**[摘要]**古偉瀛認為，應以“後現代”對照中國傳統史學，利用傳統的資源，採用後現代的“論述分析”方法，避免其所指出的弊端。最好的歷史學應該注意質性研究與量化統計並重；同時探索個人動機並進行心理分析，將理性與潛意識的作用共同考量。堅持歷史書寫“近真”的信念，達到多數可接受的“開放性真相”。白永瑞認為，“好的歷史學”應當是歷史學家進入其所處的社會現實中，在努力生產和普及與社會現實相關的歷史知識的同時，不斷反思他所提出的實用性是否與公眾所關心的問題相符；更具體一點說，“好的歷史學”是在按照“學術規範”將社會議題轉化成學術議題的過程中得以實現的，未來將會走向“共感的歷史學”與“批評的歷史學”相互融合之路。陳紅民認為，對歷史的解讀與表達已趨向多元的今天，研究歷史的理念與方法也趨向多元，歷史學的社會功能也呈現多元，因此，對“什麼是最好的歷史學”的追問，祇能針對不同層次，尋找不同的標準。邱燕凌認為，“最好的歷史學”無論是作品還是研究方法，都是優秀歷史學家創造出來的；反觀這些歷史學家的共同特徵，都是仔細地對待寫作、閱讀和教學，還有一個關鍵的因素就是個人興趣；正是他們非常熱愛歷史學工作，能從各種不同的實踐活動中得到樂趣和滿足，纔使他們在具有開創性及革新精神的創作中永不停止地追尋，不斷地在創建一個個全新的學術領域。潘光哲認為，民國時期的蔣廷黻冀望歷史能供給大眾“知識之光”；如果能點亮“知識之光”，當然算得上“最好的歷史學”了，但過往的歷史舞臺上有哪些問題值得追問求索並沒有標準杆尺，怎樣詮解其意涵也沒有標準答案，都是史學工作者自己選擇的結果，而且，天地之間足可制約史學工作者的現實精神/物質條件不知凡幾，所以，“知識之光”的理想固然崇偉，但從蔣廷黻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時發表文章稱譽琦善、貶低林則徐抗英的背景看，這也祇是他“高貴的夢想”而已。

**[關鍵詞]**歷史學 最好 標準 層次 多元

**Title:** What is the Best Historiography

**Abstract:** Gu Weiyi thinks that postmodern history should make reference to the traditional history of China, and to make use of the traditional resources as well as to apply the postmodern “discourse analysis” in order to avoid the deficiencies indicated in postmodernism. The best historiography should take note of both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while exploring the individual's motive and conducting psychological analysis. Besides, it should also take the functions of rationality and subconsciousnes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best historiography should adhere to the belief of “nearly true” and to reach the “open truth” which are accepted by the majority. From Baik youngseo's point of view, “a good historiography” is that historians get into the social reality where he is living, and to make constant reflections on whether the practicability they proposed is consistent with the issues that the public concern, while cultivating and popularizing the historical knowledge related to social reality. To be more specific, “a good historiography” is achieved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social issues into academic

issues in accord with the "academic discipline". The future trend will be the integration of "empathetic historiography" and "critical historiography". **Chen Hongmin** thinks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and expression of history is diversified nowadays. Same as the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used for history studies,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historiography tend to become diversified. Therefore if we are asking "what is the best historiography", we could only put our focus on different levels and seek for different standards. **Emily M. Hill** believes that the best historiography is created from excellent historians, regardless whether it is a piece of work or a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contrast, these historians share a common feature: they are very careful in writing, reading and teaching. One more key element is their personal interest; their enthusiasm for working in history as well as the fun and satisfaction brought from various practical activities motivate them to move forward in their creative works, which are full of pioneering and innovative spirit, and enable them to keep creating brand new academic areas. **Pan Guangzhe** thinks that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Jiang Tingfu hoped that history could bring the "Glow of Knowledge" to the public, which w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best historiography" if it was lighted up. However, in the stage of histor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standard pole for measuring which questions worth asking, nor there are standard answers for interpreting their meanings; all of them are the outcomes chosen by the historians. Since historians are regulated by numerous realistic spirits/material conditions, the "Glow of Knowledge" is of no doubt a lofty ideality. However, in view of the article by Jiang Tingfu in 1931 in which he praised Qi Shan while disparaged Lin Zexu with the anti-Britain era, his ideality is only a "noble dream".

**Keywords:** historiography, the best, standard, levels, diversity

## 後現代史學在“最好的歷史學”中的角色

古偉瀛

(臺灣大學 歷史系，中國 臺北 10617)



自從歷史學由科學化轉向多樣化之後，在後現代史學的影響下，西歐中心論的“大寫歷史”被否定，“微觀史”、“日常史”和“新文化史”等流派產生，並成為目前研究的潮流。<sup>①</sup>針對一些學者認為後現代造成的衝擊會讓歷史學絕處逢生、終結危機，筆者試圖透過對後現代觀點的歸納和反思，探討後現代有可能對中國歷史學界帶來什麼樣的衝擊和影響，以及是否有可能讓歷史學更趨近於理想？

### 一、後現代史學在中國大陸研究的不足及困惑

從20世紀90年代起，後現代史學帶來的挑戰逐漸在華人學術界受到重視。<sup>②</sup>在大陸學術界則是從1998年左右引入，到2004年達到討論的高峰。<sup>③</sup>儘管後現代歷史學異軍突起，蔚為風潮，但研究方面的局限及內部的複雜性，還是在華人學術界引發了許多批評和困惑。張光華歸納出後現代史學研究的四方面不足：（一）解釋說明多，引申發揮少；（二）對後現代史學做出系統梳理的著作較少；（三）理論較少運用於實際；（四）學術泡沫化：後現代詞彙頻繁使用，“多少帶有炒作和虛張聲勢的意味”。<sup>④</sup>其實，所有的西方史學理論傳到中國來都可能有這些“不足”，這不祇是後現代史學的問題。但具體而言，許多討論後現代的學者，

①② 古偉瀛、王晴佳：《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0），第200—201、343頁。

③ 張光華：“大陸學界‘後現代與歷史學’研究述評”，《蘭州學刊》3（2008）：118。

④ 張光華：“大陸學界‘後現代與歷史學’研究述評”，《蘭州學刊》3（2008）：120；俞金堯，“令人困惑的後現代”，《學術研究》11（2004）：11。

認為其理論缺乏宏大叙事，將會導致史學碎片化、微觀化、原子化，無法達到史學鑒戒以及尋找認同、追求意義的功能。語言學方法固然有利於深化理解，但若是淪為語言決定論，將導向史學虛無化。

針對語言導致的問題，韓震、董立河在《歷史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提出他們心目中的解決之道：

說後現代主義歷史哲學是胡說，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因為它確實擊中了現代歷史編纂學的要害，即它忽視了自己活動的主觀性，使歷史認識處在新的樸素層次上。我們唯一的出路就是，建立超越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綜合性視野，接過後現代主義歷史哲學的主觀性原則，將其納入更高層次的理解系統之中，使主觀性原則成為服務於新的客觀性原則的要素。<sup>①</sup>

對後現代史學要“批判性地揚棄”，這“揚棄”顯然是比較負面的一種看法。也有一些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早已能够說明歷史學的客觀存在，因此不會受到後現代主義的影響：

歷史實在的確存在一些客觀的規律和模式，通過歷史學家或哲學家積極的探索和研究，它們完全可以被相對真實地揭示出來，馬克思關於歷史的思想就是典型的例證。……馬克思主義把實踐概念引入歷史認識，從而在實踐的基礎上將歷史認識的主觀性和客觀性辯證地統一起來。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學本身的意識形態性是一種客觀存在，否認這一點就是一種唯心主義的表現。<sup>②</sup>

強調能將主客觀結合的實踐史學，這是一些大陸學者的看法。但歷史學畢竟最終以敘述呈現，而此未能解釋或討論語言客觀性問題，仍未能與後現代史學進行對話。

中國人民大學的楊念群教授，曾就後現代進入中國史學界的問題做過細緻觀察。他在2003年就指出中國學者將後現代與薩義德(E. W. Said, 1935—2003, 也譯作“薩依德”)的“東方主義”相參照所暴露出的缺陷：

“東方主義”恰恰強調的是在跨民族—國家狀態下的互動，這種理論路向當然有其重大意義，但當它被移植到中國後，除了給中國學者獲得了得以昂首進入“後現代”理論殿堂的通行證，因而終於找到了一個重新充當批判型知識人的自我角色認同的機會之外，還給中國的“後現代”提倡者提供了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即當他們津津樂道於批判西方如何歪曲中國的形象時，其實他們恰恰忽略了如何從中國內部的角度，反思和批判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給中國內部變化所帶來的一系列後果，從思想根基、經濟互動、社會變遷與政治劇變的多層次梳理中國近代以來如何從傳統社會形態向資本主義形式過渡的歷史遺產。<sup>③</sup>事實上，“東方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兩者大異其趣。<sup>④</sup>東方主義將“東方”加以“本質化”、“刻板化”，而後現代主義則主張存在先於本質。前者在進行宏大敘事，後者則反對宏大敘事；前者相信歷史真實的存在，纔能提出東方與西方相參照的理論，後者則不相信（被記錄下的）真相存在的可能；前者相對支持民族獨立和自覺，後者則認為民族是被“建構”出來的。<sup>⑤</sup>兩個看似背道而馳的觀點，不少中國“後現代”論者透過自身對中西方現代性的思考路徑，將兩者結合起來：

<sup>①</sup> 韓震、董立河：《歷史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sup>②</sup> 蔣重躍：“回應挑戰 啟迪深思：《歷史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西方後現代歷史哲學研究》讀後”，《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5（2008）：72—76。

<sup>③</sup> 楊念群：“‘後現代’思潮在中國——兼論其與20世紀90年代各種思潮的複雜關係”，《開放時代》3（2003）：7。

<sup>④</sup> Swanson, Herbert R. “Said’s Orientalism and the Stud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3 (July 2004): 107—112.

<sup>⑤</sup> [美]愛德華·薩依德(E. W. Said):《東方主義》（臺北：立緒出版社，1999），王志弘、王淑燕、莊雅仲等譯。關於民族的“建構”（後現代思潮）或是“自覺和自在”形成（回應後現代挑戰）的討論，參見楊念群：“‘危機意識’的形成與中國現代歷史觀念的變遷”，《史苑》（中華文史網）13（2006）。

中國的“後現代”論者由於一開始把注意力過度集中在如何辨析西方對中國形象的塑造上，力求由此說明中國現代社會的產生是現代資本主義全球框架塑造的結果，這很容易把自身的思考路徑局限於一種外在的民族主義形式的對抗性姿態的表述上，而忽視了對真正中國傳統在制度具體運作形式中所起作用的探查。<sup>①</sup>

事實上，後現代主義的主要內容之一是要去中心化，很自然地，受到後現代主義影響的華人很容易會熱情地擁抱東方主義。然而，若祇聚焦於西方影響論，強調中國民族主義對抗西方資本主義，就不能發掘後現代學說的真正價值。受到在美國的中國學者影響，社會史的“人類學轉向”造就中國社會史、地方史研究的興起。<sup>②</sup>重視“文化”的作用，亦可視為是後現代思潮影響之一。然也要注意，因為後現代的“反現代”立場，也帶來敘事上過猶不及的流弊：

“後現代”敘事也往往容易忽略對基層“文化”傳統進行有力塑造的現代化過程作為支配性因素所造成影響的分析（包括政治與社會的諸多複雜因素的作用），因為刻意強調對現代化後果的抵抗意義，所以較容易過度強調了“文化”作為維繫社會運行的穩定性作用。<sup>③</sup>

楊氏在2009年發表《中國歷史學如何回應時代思潮》一文，也指出在中國流行的“後現代”與民族主義、回歸傳統結合的吊詭：

中國史學界打着“後現代”旗號的一些作品往往變成了對前現代的一種“懷舊”和景仰。也就是說，“後現代”變成了“前現代”的同義詞，或者說在中國史學界，“後現代”碎片化歷史的策略變成了無原則地肯定“前現代”歷史價值和行為方式的一種態度表達。從某種意義上說，史學界“後現代”探索的這種取向無意中與“國學熱”對傳統文化無原則的極度弘揚相互配合了起來，從而使現代的歷史觀表面上擁有反現代敘事的特徵，卻因一味倡導走回“舊社會”老路而跑向另一個極端。我認為這也是缺乏批判能力的表現。<sup>④</sup>

因此，他對“後現代”在華的反省意義提出根本的質疑：

就中國目前的思想狀況而言，我們很難在與現代性問題相對立的哲學層次上定位“後現代”思潮。在中國思想界，“後現代”主張首先意味着是一種重新確認自身位置的知識態度，這種態度由於獲取了某種“民族主義”的時代包裝，和標示出了要為民衆代言的底層立場，在表現上似乎與20世紀80年代有關現代性的普遍主義有所區別。但這種姿態由於沒有真正區分民衆在傳統中所扮演的角色與現代民族國家所賦予的“民族身份”之間的差異性，又由於其對市場機制的滲透採取了欲拒還迎的曖昧態度，所以其所謂反思的有效性是十分令人生疑的。<sup>⑤</sup>

認為中國學者所提倡的“後現代”，往往祇是民族主義的時尚化，以及名義上的底層化，並沒有達到哲學反思標準。楊氏認為，如果要解決當今中國史學的這個問題，應該要從一些共通的“中層要素”着手，防止後現代思潮影響帶來的史學“碎片化傾向”。<sup>⑥</sup>

從以上討論可知，若要正視“後現代”對中國史學的影響和價值，不能照搬20世紀中國近代史的“衝擊—反應”模式，而是要對照中國傳統史學，來尋找後現代史學在中國的未來出路。

## 二、後現代主義與中國傳統史學

傳統中國最早的“良史”標準，在於“直書”。《左傳》宣公二年（前607）載：

<sup>①③⑤</sup> 楊念群：“‘後現代’思潮在中國——兼論其與20世紀90年代各種思潮的複雜關係”，《開放時代》3（2003）：19—20、25、27。

<sup>②</sup> 楊念群：“‘在地化’研究的得失與中國社會史發展的前景”，《天津社會科學》1（2007）：115、129。

<sup>④</sup> 楊念群：“中國歷史學如何回應時代思潮1978—2008”，《天津社會科學》1（2009）：129。

<sup>⑥</sup> 楊念群：“‘新典範’和‘舊史學’的衝突與調適——對中國現當代史學變革的一個貫通性解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6（2012）：114—115。

乙丑，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sup>①</sup>

班固（32—92）著《漢書》，於《司馬遷傳》之“贊”中亦言：

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sup>②</sup>

“其文直，其事核”的“實錄”風格，表現史家自始至終對於真實的追求。這是良史的兩種定義，但可以有不同風格的。例如，《後漢書·班彪傳》中范曄（398—445）又對司馬遷（前145—前90）與班固進行了比較：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材。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sup>③</sup>

不論是強調直書或敘事詳明，中國傳統早期的良史的標準都是相當簡單而原則性的。然而，世易時移，祇是秉筆直書，善惡不隱，無法產生說服力。唐代以後，開始注重會通；清代以來，重視寓褒貶於事實，章學誠（1738—1801）更提出重視“史德”的看法；在意識形態及利祿誘惑牽動史家“氣”與“情”的今日，“史德”更顯重要。<sup>④</sup>

直言不隱、生死以之的傳統良史標準固然令人心嚮往之，但若更進一步採取後現代觀點，以“後之視古”，更會感到清代學者乃至現代學者的批評精神還是不够的。傳統中國有許多值得再檢視的論述，尤其權力籠罩下產生的既定中心價值觀——例如，過度的孝順被視為重宗族家庭而犧牲個人；又如，重男輕女、忠君愛國、華夷之別、重視科舉等等，表現了對朝廷及意識形態的屈從。這些都是古代知識體系氛圍中的產物，可以在寫史時重新討論和審慎看待。於是，中國傳統的理想史學和後現代史學產生出一種戲劇性的對照。

### 三、後現代史學在未來中國的出路

雖然後現代主義在中國應用時能够抵抗西方中心主義、超越現代化敘事，特別是在反對民族主義論述上呈現很強的生命力，但如何處理革命史敘事及一些意識形態問題，與如何加以應用、動員中國傳統提供的資源，尚有努力的空間。語言學的轉折是後現代的一大特點，但在華人世界，由於中文的象形特色以及史權的長遠影響，在語言理論上的衝擊及應用尚未充分展開。後現代有一個很重要的方法學就是“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或許是未來史學撰述時可利用的一種方法。

英國的“後現代”史家索思蓋特（B. C. Southgate）曾提出後現代史學著作的三大最重要特色——“自我反思”（self-reflexivity）、“語言敏銳”（linguistic awareness）、“容許模



司馬遷畫像

班固畫像

① 《十三經註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清〕阮元校，第6冊，第365頁。

②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97，影印中華書局點校本），第2738頁。

③ 〔劉宋〕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97，影印中華書局點校本），第1386頁。

④ 古偉瀛：“撰史憑誰定良窳？——試論‘良史’的變與不變”，《臺大歷史學報》44（2009）：1—41。

糊”(tolerance of ambiguity),<sup>①</sup>認為後現代對於史學的意義就是它的“自我反思”特性：

自我反思性是作品的核心，透過全書告訴吾人歷史是有意以“意識到自己是一加工品出現的……含義多重且是開放式的結局”。因此，自我反思式的史家不但不會像一般史家所主張的，與其著作保持距離，反而會不時介入其寫作中，鼓勵讀者意識到其間的問題及所採取的設計。<sup>②</sup>

他們能够反省各時代史家的解釋，對詞彙的定義和形塑，都與自身觀點及所處的社會背景、語言甚至情緒產生關係。<sup>③</sup>理解這些差異，就更能避免自以為是的“中立”、“客觀”。即使是描寫記錄戰爭或傷痕的過去，也不以居高臨下的態勢或倨傲的言語來面對爭端，而是重新用敏銳的眼光檢視其不確定性，廣泛採用各種不同觀點的資料提供可能的解釋。因此，用後現代看歷史學在西方的前景，反而能與傳統相結合，而且充滿希望，因為過去對未來是如此的重要，<sup>④</sup>正如哈魯圖尼恩(H. Harootunian)所言：

在現代性所引發的衝擊中，所有的集體記憶、所有“主動的回憶”都是用來保護個體，免於受到震懾。藉由將事件撰成歷史，往往可以達成磨平棱角、舒緩突兀，並使過去的變遷看來像是自然發展的結果<sup>⑤</sup>

後現代能幫助歷史研究從各種觀點切入，療傷止痛，打造較好的未來。充分反省、重視多元的歷史，與現在的社會血脈相通，也因此有了溫度，有了魂魄。

此外，由於後現代的顛覆性及破壞性，不承認絕對的客觀及真相，打破現代性的某些封閉論述，常能維持開放的立場，因此有了與過去割裂的契機。美國的“新實用主義”(New Pragmatism)者，也是後現代的代表人物里查德·羅蒂(R. Rorty, 1931—2007)就主張，歷史研究應該讓人產生對未來的希望。<sup>⑥</sup>這聽起來好像宣傳家一樣。與歷史的傳統、清末以來的史家期望能中立地讓史料說話有點不同，羅氏認為這是歷史在未來的出路。然而，若採取完全開放的立場，則將沒完沒了，言人人殊，各是其是，無法形成讓人能够理解的論述。我還是主張應該“暫時的封閉”，限定範圍，加以整理。但如何從一團混亂中建構歷史秩序？索思蓋特提供了他的見解：

“如何和從哪開始？”祇是一個起頭（開場白），提醒着我們，任何有意義的論述——秩序井然有條有理的起承轉合——都是由史學家在所研究的題目上強行安排加入的，而且是在事件之後纔安排的。生活本身（從吾人經驗所知）往往是無有具體輪廓形狀的，“由一系列不相連貫的情節組成，並沒有明顯的動力引向故事高潮，而且作者也隨時準備承認他故事主角所生活的世界裏，當時的事情並非一件件很有秩序地發生”。祇有在回顧時，吾人的記憶努力去造出一個“流暢的敘述”強加在事件之上的，其方式是很方便地忘記那些構成實際生活缺陷的干擾、問題和衝突。<sup>⑦</sup>

為了便於說明和敘述，歷史書寫並非過去本身，而是在事件發生之後，敘事者化約記憶，除去冗蕪，發揮想像，佈置情節，最後留下來的部分。即使有些重組和忘卻是無意識產生的，或是受到語言特質的限制而轉化，但這一“流暢論述”的寫作過程，與中國傳統史學家“尚簡”的看法<sup>⑧</sup>，仍能互相呼應。

伊格爾斯(G. G. Iggers)和王晴佳在近年出版的史學理論著作中，提到史學經過後現代挑

<sup>①②③④⑦</sup> Beverley Southgate, *What is History fo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154, 159, 155, 160, 173—174, 155.

<sup>⑤</sup> Harry Harootunian, *History's Disquiet: Modernity, Cultural Practice, and the Question of Everyday Life*,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18—19

<sup>⑥</sup> Richard Rorty, *Achieving our country : 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39—140.

<sup>⑧</sup> 章益國：“論傳統史學的‘尚簡’”，《史學理論研究》2 (2001)：20—23。

戰以後發展的大趨勢：（一）文化與語言的轉向；（二）性別及婦女史；（三）歷史與社會科學的新結盟；（四）不再強調國族主義；（五）世界史及全球史的書寫。<sup>①</sup>這些觀察已超越後現代史學的影響，因為後現代史學是很反對宏大敘事的，而未來趨勢卻是要走向“全球史”（global history），這也勢必影響未來的中國史學。

“全球史”是將各個地方有機地聯結的一種歷史，是史家在當代不可避免、必然會遇到的問題。雖有所扞格，但如何將後現代的啟示融入全球史的論述之中，應該是吾人應當注意的課題。當然，去中心化、反一元論以及時時警覺自己的論證背後的權力關係是矯正當代史學流弊頗好的良藥。無論是世界史還是全球史，在各層面上都應該對等、溝通、交流，像哥特式大教堂中的玫瑰花窗那樣，各地區均如花瓣，展現不同色澤形貌，但都同等重要，同構一幅均衡完美、瑰麗多彩的花樣。<sup>②</sup>

至於什麼是最好的歷史學？依筆者之見，最好的歷史學應該注意質性研究與量化統計並重；同時探索個人動機並進行心理分析，將理性與潛意識的作用共同考量。這些想法雖然會受到較激烈的後現代學家的質疑，認為不過是幻想，但是有不少史學的較小的議題可以透過上述方法加以解決。對於後現代，我們不是要“批判性地揚棄”，而是應“批判性地繼承”、“創造性地轉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堅持歷史書寫可以“近真”（approaching the truth）的信念，達到多數可接受的“開放性真相”。就算隨時準備修正結論，也必須以“暫時性的真實”來面對生活以及準備更美好的未來。

[古偉瀛（1949—），男，生於中國臺北市，1983年獲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1994—1997年任臺灣大學歷史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長，現為臺灣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天主教會史和史學方法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清季的立憲運動——處理變局的最後抉擇》、《臺灣天主教史研究論集》、《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與王晴佳合著）等。]

## 走向“共感”與“批評”相融合的新歷史學

[韓國]白永瑞

（延世大學 歷史系，韓國 首爾）



想給“好的歷史學”下一個約定俗成的定義是不太可能的，但它在學者之間也並非沒有一些共識。從以“公共性”（publicness）為媒介的歷史學來說，“好的歷史學”應當是歷史學家進入其所處的社會現實中（即入世），在努力生產和普及與社會現實相關的歷史知識的同時，不斷反思他所提出的實用性是否與公眾所關心的問題相符。更具體一點說，“好的歷史學”是在按照“學術規範”（discipline）將社會議題轉化成學術議題的過程中得以實現的。在此，我想探討一

<sup>①</sup> Georg G. Iggers, Q. Edward Wang,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Harlow, England ;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2008).  
[美]伊格爾斯、王晴佳：《全球史學史：從18世紀至當代》（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楊豫譯，第410—417頁。

<sup>②</sup> 哥特式大教堂玫瑰花窗的譬喻，參見黃家城：《中國人的心靈與基督宗教》（臺北：光啓文化事業，2013，原著1957年出版），第82頁。

下作為“共感的歷史學”與作為“批評的歷史學”的融合。

### 一、作為“共感的歷史學”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東亞進入了所謂的“後冷戰時代”，各國開始在多領域進行交流，各國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也日漸加深。但是，頻繁的交流和接觸也導致了新的糾紛，勾起了一段在“冷戰”秩序下被壓抑的國家間糾紛的集體記憶。因此，消除歷史糾紛成為十分緊要的問題。

在有關政府的支持下，或在民間自發的努力下，各方通過各種渠道開展了關於歷史的共同研究和相互對話。其討論的焦點是：通過克服本國中心主義的歷史觀，尊重歷史認識的多樣性，檢驗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實現歷史認識的共享？在此過程中出現的大量研究不僅糾正了偏頗的歷史知識，還發掘了很多過去相互交流和合作的歷史。為了讓一般讀者也能夠分享到這樣的研究成果，還編纂出版了一系列的“共同歷史教科書”。其代表出版物就是中、韓、日三國學者和教師共同執筆完成的《開創未來的歷史》。<sup>①</sup>

當然，“共享歷史認識”不是指東亞人具有單一的、共同的歷史認識，而是追求多種差異的共存。在“尊重”這一基礎上，為了更加有效地運用積累至今的努力成果，我認為到了該把目光投向“共感的歷史學”上的時候了。

以往我們所熟悉的歷史學可以說是“作為科學的歷史學”，即追求關於過去事實的原因和結果的知識的、作為“說明（或分析）的歷史”。除了這種作為“說明的歷史”之外，我還想強調作為“認同(identification)的歷史”。這兩者都是我們面對過去的方式。不過，作為“認同的歷史”意味着以想象力或認同來與過去相遇。特別是，通過與生活在過去的人們形成一種“共感”關係，可以反思生活在現在的我們自身的身份，也可以把過去的生活作為我們現在生活的一面鏡子，通過這面鏡子實現過去與現在的對話。

所謂“共感”（empathy），這裏是指一個人能夠理解他人的情感與立場並對其進行恰當反應的能力。<sup>②</sup>情感或感情表現是人類普遍的心理現象，因此，一個人有能力把別人視若自己，並感同身受。也就是說，人可以通過“共感”明白“為人”的意義，領悟理解他人（的幸福、悲傷、痛苦）的重要性。不過，這裏有必要強調一下“共感”與“同情”的區別。“共感”雖與“同情”（sympathy）在情緒上雖具有共同點，但與被動的“同情”相反，“共感”是出於積極主動的意願，即一個人願意自發地成為他人經驗的一部分，共享他人對經驗的感受。<sup>③</sup>



中、韓、日三國共同編纂的《開創未來的歷史》

<sup>①</sup> 韓、中、日三國共同歷史編纂委員會：《開創未來的歷史》（首爾：民族出版社，2005）。這本書的日文版是《未來を開く歴史》（東京：高文研出版社，2005），中文版是《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sup>②</sup> 20世紀初開始廣泛使用的“共感”一詞，是羅伯特·費舍爾(Robert Vischer, 1847—1933)於1872年在美學中使用的德語“Einfühlung”（移情），1909年在美國翻譯成“Empathy”（[美]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共感時代》（首爾：民音出版社，2010），李京南（音）譯，第55頁）。構思這篇文章的基本框架初期深受以下書的啟發：[美]瑪麗·戈登(Mary Gordon)：《共感的根》（首爾：shanti, 2010），文姬京（音）譯。

<sup>③</sup> [美]杰里米·里夫金：《共感時代》，第20頁。與里夫金不同，弗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主張同情直接聯繫到行動，這與共感不同。根據他的主張，共感是收集他人信息的程序，而同情却是對他者的擔心，緩解他者困境的一種衝動或願望（[美]弗蘭斯·德·瓦爾：《共感時代》（東京：紀伊國屋書店，2010），第128頁）。

我期待“共感的歷史學”能够培養出比讀寫能力更為重要的“情感素養”（emotional literacy），使人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場上觀察事態或世界，並從中發掘出解決糾紛的能力。因為，“共感的歷史學”更注重與過去的人們形成共感關係，力求理解隱藏在歷史人物行為背後的情感和動機，而不僅僅是觀察他們的行為並對其進行道德判斷。這纔是把我們引向歷史和解之路的捷徑。<sup>①</sup>

在此需要強調的是，如果“共感”祇停留於簡單的“移情”（感情移入），那麼真正的歷史和解還是無法實現的。“共感”不僅要求有深深體諒他人之心的真誠性，同時還要懂得這種理解也有局限性。因此，既需要具備共感他人處境的能力，還需要甄別導致差異的歷史脈絡的能力。在歷史教育中積極引入“共感”概念的斯托克利（David Stockley）認為，“共感”既是想象的行為，也是分析的行為，因此，為了完整地說明歷史，要把理解歷史行為者的動機或意圖、對導致這些行為的狀況的分析以及具體狀況的證據結合起來，即“歷史共感的重構既是感受他人的經驗，又是在證據和兒童（即學生——引用者）/歷史學家之間形成的想象的和分析的相互作用”。<sup>②</sup>我提倡作為“共感的歷史學”和作為“批評的歷史學”要相互結合的理由也在於此。

## 二、作為“批評的歷史學”

“批評的歷史學”所說的“批評”，不是“誹謗”或“合理的分析”，而是意味着“判斷”。具體地講，就是對“生活”（life）的“解釋、評價、感受、相互交融的分享”（interpretation, evaluation, feeling for, sympathetic sharing in）<sup>③</sup>。因此，“共感的歷史學”與“批評的歷史學”的結合是很自然的事情。

其實，在東亞歷史學的傳統中，叫做“史評”的歷史批評早已發達。古代史書中，在各段的結尾處，就已經出現了論贊（如《左傳》的君子曰、《史記》的太史公曰、《漢書》的贊曰等），而且“史評”已成為圖書、學術領域的一個獨立項目。它具有雙重意義，既是對歷史本身的批評，同時也是對其敘述的批評。

由於當時的“史評”注重的是按照儒家價值的道德、倫理對歷史進行褒貶評價，所以，一直以來就存在關於史評是否會模糊歷史真相的爭論。尤其是到了近代“科學歷史學”的觀點出現以後，對史評的主流評價是趨於否定的。但是，不能忽視的是，“褒貶”是在以“人具有選擇的自由”為前提的人文學傳統中形成的。<sup>④</sup>而且，也有學者試圖像劉知幾——中國最早的以史評為主的著作《史通》的作者——那樣，主張要把道德上的價值判斷和知識上的事實判斷合二為一。因此，如今也開始出現了一些試圖超越近代歷史學的局限，重新評價傳統時代“史評”價值的觀點。<sup>⑤</sup>在這一點上，具有價值判斷性質的“批評的歷史學”自然而

① 當然，我並不是提出“共感理解”（empathetic understanding）在歷史理解上的重要性的第一人。韓國的西方史研究者趙志衡把歷史學家在自己“心理重演”（re enactment）過去事實並努力追逐體驗，看做是一種共感理解。這意味着歷史學家把自己當成過去事件的主人公（當事人），共享和思考其經驗〔[韓]趙志衡：《尋找歷史的真實：ranke和Carr》（首爾：金英出版社，2006），第118—119頁〕。還有一種是，考察歷史的“多重觀點”，即為了解決法國和德國之間的歷史糾紛而引入的“兩種視角”（deux points de vue），也許可以被看做筆者所講的“共感的歷史學”〔[韓]金承烈：“跨越歷史的國境：德國—法國共同歷史教科書”，《歷史批評》（春季版，2008）〕。非常感謝金承烈教授提醒以上兩點。當然，從廣義上講，共感的歷史學同日常生活中常提到的“易地思之”（將心比心）態度相通。不過，“共感的歷史學”不僅針對歷史學家，而且也強調培養史書讀者的感性能力和認同感，這應該就是兩者的差異。

② David Stockley, “Empathetic Reconstruction in History and History Teaching”, *History and Theory* 4(Dec., 1983): 61. 非常感謝柳熙錫教授給我提供了這些資料。

③ [韓]尹志寬：《近代社會的教養和批評：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的研究》（首爾：創作和批評社，1995），第233頁。

④ 因為，如果歷史人物的行為都是由“社會法則”或“超力量”決定的話，歷史學家是不可能加以褒貶的。參見余英時：“章學誠和Collingwood的歷史思想”，《中國的歷史認識（下）》（首爾：創作與批評社，1985），[韓]閔斗基編，第652頁。

⑤ 李紀祥：“中國史學中的兩種‘實錄’傳統——‘鑒式實錄’與‘興式實錄’之理念及其歷史世界”，《漢學研究》2（2003）。同時，之所以強調劉知幾的基於事實的歷史敘述的正確性（實錄直筆），是因為他主張強化倫理效果。最近學術界出現了“對他來說真與善並非是分離的”見解。[日]志野好伸：“他者の言語をどう扱うか：《史通》の歴史叙述批評”，《中國哲學研究》11（東京：東大中國哲學研究會，1998）。

然地會與東亞歷史批評的傳統相遇。但是，這並不意味着要重返舊的歷史學，而是要創造性地吸收它。通過這一過程，可以開啓一條新的歷史學之路：既保留科學歷史學的長處，又能對其進行創新。

首先，歷史學家的價值判斷可以起到“生活批評”（criticism of life）的作用。“生活批評”是從英國詩人馬修·阿諾德（M. Arnold, 1822—1888）的單詞中借用而來的。這裏的“生活”並不祇限於個人層面，也包括社會層面；不祇具有文學的內涵，也具有政治內涵。所謂的“生活批評”，不僅具有“對生活批評”之意，還包括成為生活的一個標準的“被生活批評”之意。因此，歷史過程中，人們從實踐的角度和生活經驗的角度提出的新的問題，就成為批評的標準。

作為“批評的歷史學”，雖然重視價值判斷，但歷史學家的價值判斷在歷史過程中不能是獨立的、恣意的。如果認為事實“不是作為某個實體（thing）而存在，而是實際（reality）存在於現實過程中”，那麼，價值判斷同樣也是“在歷史事實上發生的價值乃至對人類可能性的一種應對”。<sup>①</sup>這樣一來，展現事實的歷史學課題，就與表現內在於事實當中的人的可能性密切相關，這在實踐上又與在現實當中的大眾們的生活所包含的可能性相通。換句話說，就是要將歷史過程中的人們在實踐中所關心的問題與生活中的經驗作為批評的標準。

其次，“批評的歷史學”將“祇有在通過學術積累形成的恰當的程序下，事實纔會表現出其真相”作為前提。因此，它同以歷史學邏輯為基礎的嚴格程序和經驗性證據進行對話，並始終堅持“自我批評和修改概念的辯證法方式”。<sup>②</sup>不是作為一種制度，而是作為一種研究姿態和方法的“批評的歷史學”。要成為一門學科，必須接受原有歷史學分科研究上的規範和“訓練”（discipline）。否則，我們怎樣追求充滿創意性的學問也祇會變成無謂的行為或空想的活動。

最後，“批評的歷史學”祇要帶有“批評”這一性質，除了普通的專業歷史研究者的訓練之外，還需要同時進行批評家式的訓練，即進行“作為正確閱讀歷史文本的讀者”的訓練。不過，這裏所說的“批評家”是這樣一種人：“在讀者群中要成為‘最正確閱讀的人’，並把自己的讀書經驗整理成文，想最大限度地提升‘正確閱讀的人’的水平和數量。”通過這些，他/她能從一個平凡的讀者發展成為撰寫批評文的特殊的讀者，所以也能够做到謙虛。再說，從事“批評的歷史學”研究的人，它的活動橫跨歷史文本的生產、接受（或消費）兩個領域，所以能够克服專門化的歷史研究所面臨的與一般讀者溝通難的障礙。<sup>③</sup>

美國作家瑪麗·戈登(M. Gordon)通過研究發現，“如果受到共感訓練，可以提升批判能力和創造性思考”<sup>④</sup>。借用到歷史學中，如果對歷史具有共感能力並同時具備歷史批判能力、創造性思維能力的普通讀者和歷史研究者共同構成歷史研究的主體，那麼，“共感”與“批評”相融合的新歷史學纔能得以開啓，進而歷史認識的差異也能成為有效的“刺激物”（irritant）。當一種歷史學能通過上述作用使我們不斷反省自己待人處世的視角和姿態時，應該就是21世紀所需要的“好的歷史學”吧！

〔白永瑞（1953—），男，韓國延世大學歷史系教授、國學研究院院長，韓國中國近現

<sup>①②</sup> [韓]柳在建：“E. P. Thompson的歷史方法論”，《歷史教育》39（韓國，1986）：317, 316, 335。

<sup>③</sup> [韓]白樂晴，“批評和批評家的隨想”，《統一時代韓國文學的價值》（首爾：創作與批評社，2006），第460頁。這部分的內容給我的啟發很大。

<sup>④</sup> [美]瑪麗·戈登：《共感的根》，第164頁。

代史學會會長，《創作與批評》的主編，主要從事近代東亞的文化認同和中、日、韓三國的亞洲觀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回歸東亞：探索中國的現代性》、《思想東亞：朝鮮半島視覺的歷史與實踐》、《在核心現場重新看東亞：為了共生社會的實踐課題》等。]

## 什麼是好的歷史研究：以蔣介石研究的三個面向為例

陳紅民

(浙江大學 人文學院 歷史學系，浙江 杭州 310028)



為了準備“什麼是最好的歷史學”論壇，筆者做過兩次小的訪談：一次是2013年春節期間去探望著名的史學家——南京大學茅家琦教授（他是筆者的碩士生導師，也是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裴宜理教授在南京大學訪學時的老師）。茅教授已經八十七歲，仍然筆耕不輟。當筆者請教他“什麼是好的歷史學”時，他的回答是，還是要回到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筆者又請教他對蔣介石研究怎麼看，他說，做這個課題沒有意思，太小了，就是弄清許多歷史事實也沒有意義，還是要從大歷史着眼。另一次是為新入學的歷史學系博士生開設的“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第一堂課上，筆者請學生回答“什麼是最好的歷史學”問題，學生普遍的反應是驚詫：老師怎麼會問這樣的問題？無人回答。筆者只好換個角度提問，你們未來都要寫博士論文，那你們認為什麼是好的博士論文，並逐個詢問，多數學生還是惘然以對。有個學生說，判斷好不好的標準是由大專家們或學術刊物制定的，他們說是好論文自然就好。祇有一個學生說到，好論文應該用新史料，新方法（可能是受上課時的特殊語境啟發）。這兩次訪談，讓筆者感慨良多：在茅家琦教授那裏，過去他是以做實證研究具體問題、並且強調用檔案出名的，記得他教導我們，祇要材料過硬，別人就無話可說；而今我們照着他的教導去做時，他已對此不以為然；這反映出，即使是優秀的學者，“什麼是好的歷史學”的標準也會改變。在學生這邊，當進入到博士學習階段時，還沒有想到過“什麼是好的歷史學”這個問題，如果沒有理論的引領，沒有問題意識，未來是很難能做出好的論文的。當然，由於“什麼是最好的歷史學”問題涉及歷史學研究的對象、目的、功能，涉及歷史學研究成果的表述方式、史觀等諸多方面，不同的社會環境、不同的目的會給出不同的答案，所以，筆者在此祇能以目前進行的蔣介石研究為例加以闡述。

1949年至今的六十餘年，中國大陸對蔣介石研究的基本軌跡經歷了從一個“蔣介石”到三個“蔣介石”的過程。1949—1978年，由於受到現實環境/政治控制的影響，強調“史學研究為政治服務”，“革命史觀”一統天下，“蔣介石”長期是作為革命對象的象徵而存在的，史學界的“研究”更多的是對陳伯達《人民公敵蔣介石》<sup>①</sup>中的結論進行註解。1978年

① 陳伯達：《人民公敵蔣介石》（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之後，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兩岸關係的解凍及新史料的出現，關於蔣介石的學術研究漸趨活躍，原來大家唯恐避之不及的“險學”變成了越來越多的學者參與其中的“顯學”。這種基於新的史觀、新的史料的學術研究，解構了原先那個作為政治符號的蔣介石，正在重構一個接近歷史真實的蔣介石。最近十多年來，中國社會因經濟的發展、教育的普及、新媒體的出現等，對蔣介石的關注呈現出越來越多元化的趨勢，人們可以更多元地考慮問題與表達意志；一部分民衆為了發泄不滿情緒，甚至有選擇性地羅列史實，在互聯網上尊稱蔣介石為“蔣公”，列出其“歷史功績”，但缺乏全面客觀與理性分析。如此一來，現時的中國實際上是存在着三個層面不同的蔣介石研究或者蔣介石形象，即“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境下的蔣介石、學術研究中的蔣介石與網絡公眾層面的蔣介石，它們分別對應政治宣傳的史學、史學研究與公眾史學。由於三個“蔣介石”各有其背景，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很難相互取代或用“最好的蔣介石研究”統一標準來覆蓋。但是，從事三個“蔣介石”研究的人，未來都有如何深入研究，更加學理化，以理服人，進而將自己的研究做得更好的問題。

### （一）主流意識形態層面的蔣介石

在中國大陸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意識形態的印痕還是相當深刻的。被列入“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全國統一教材《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中，雖不是專論蔣介石的，但對蔣介石有一些定性的描述，可以幫助人們瞭解現階段“革命史觀”之下的“蔣介石形象”。試舉兩例：

#### 1. 蔣介石是大革命時期的“投機者”：

北洋軍閥勢力的迅速崩潰，使帝國主義列強感到震驚。它們在中國集結兵力、製造事端，企圖以武力相威脅，阻擋中國革命前進的步伐；同時開始把當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看作國民黨內的“穩健派”，進行拉攏。周恩來說過，蔣介石“雖曾組織黃埔軍校，指揮北伐，但他的軍閥思想和投機思想卻與他‘參加’革命相隨而來”。在大革命初期，他“起了一般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作用”。1926年3月，他製造了中山艦事件，打擊共產黨和工農的力量。他的立場就轉到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方面，變為新右派”。……

1927年英美製造的南京事件加速了蔣介石同帝國主義勢力勾結的步伐。<sup>①</sup>

#### 2. 蔣介石是抗日戰爭時期的“妥協者”：

（抗戰開始後）蔣介石集團在決心抗戰的同時，卻又害怕群衆的廣泛動員可能危及自身的統治，因而實行的是片面抗戰的路線，即不敢放手發動和武裝民衆，將希望單純寄託在政府和正規軍的抵抗上；在戰略戰術上，沒有採取積極防禦的方針，而是進行單純的陣地防禦戰。這就使得大多數作戰未能給敵人以更大的消耗，並在短時間內喪失了大片的國土。<sup>②</sup>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以後，日本對國民黨政府採取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國民黨在重申堅持持久抗戰的同時，其對內對外政策發生重大變化。蔣介石將抗戰到底的含義解釋為“恢復到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這標誌着國民黨由片面抗戰逐步轉變為消極抗戰。<sup>③</sup>

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到來以後，由於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親英美派開始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團結抗戰的局面逐步發生危機，出現了中途妥協和內部分裂兩大危險。針對這種情況，中共明確提出“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後倒退”三大口號，堅決揭露打擊汪精衛集團的叛國投降活動，繼續爭取同蔣介石集團合作抗日。<sup>④</sup>

<sup>①②③④</sup>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沙健孫、馬敏主編，第119、149、150、155頁。

在此，可以與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對蔣介石的評論做一比對：

1. 蔣介石在大革命時期“篡黨篡軍篡政”：

(蔣介石利用反革命兩面派手法，竊取了國民黨黨權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蔣介石歷史的過程是：經過篡軍（第一軍）以篡黨篡政，現在又再經過篡黨以進一步地篡軍篡政。蔣介石企圖在這個“總司令”的名義下，形成一套完整的軍事獨裁。……這一切軍事獨裁的規模，實際上乃是大資產階級及其代表蔣介石準備最後背叛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事業的一種佈置。<sup>①</sup>

2. 蔣介石抗日戰爭時期的動機“是從四大家族的財產與統治出發”，他“不打日本人”：

(蔣介石的抗戰路線，是壓迫人民的、不斷企圖與日寇妥協的、片面的消極的應戰) 蔣介石的抗戰（他本來叫做應戰）既然不是出於真心，不是從保衛民族出發，而是從四大家族的財產和統治出發，不是從中國民族、中國人民出發，而是從國際的政治投機、觀看英美帝國主義的風色出發，因此，他的所謂“抗戰”就命定是失敗主義，而且也就隨時準備相機把抗戰結束。<sup>②</sup>

蔣介石不打日本人，專門從事反共的工作，已是天下皆知的事。<sup>③</sup>

兩相對照，與《人民公敵蔣介石》的論斷相比，雖然《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中的蔣介石仍是作為“人民公敵”、“反動政權頭目”出現的，但進步還是非常明顯的，且少了謾罵性的定語。然而，其蔣介石“投機革命”與“對日妥協”的結論，與當前學術界的研究還是有些差距的。

客觀地講，在社會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之下，主流意識形態具有宣傳教化作用的“蔣介石研究”受到了很大衝擊。主管部門已意識到這一點，正在不斷改進。“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就是從“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發展而來的，其內涵與外延在不斷拓展。<sup>④</sup>但由於主流意識形態指導下的“蔣介石研究”更多的是考慮明確的宣傳目的，對學術研究中新史料、新結論的吸納與接受較為滯後，這勢必會減弱教材普及大眾的影響力。實際上，在主流意識形態佔有廣大資源、甚至可以調控學術研究與網絡活動的情況下，即使是有明確的宣傳目的，祇要遵循學術研究的基本規律，根據史料得出結論，而不是概念先行，也能够向科學靠攏，也能起到服衆而持久的宣傳效果。

## (二) 學術研究層面的蔣介石

學術研究層面的“蔣介石”是從主流意識形態的“蔣介石”演化而來，兩者從1978年後拉開距離，漸行漸遠。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主流意識形態主要是以“革命史觀”來指導歷史研究，評判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標準也是看其對待“革命”的態度；而學術研究不可能祇用一種史觀研究，隨着中外學術交流的日益頻繁，不少學者將“民族主義史觀”、“民眾史觀”、“現代化史觀”（包括“後現代化史觀”）、“全球史觀”運用到自己的研究中來，有些學者正是學習新史觀過程中發現以往研究中的偏差而以新研究來糾偏的。二是學術研究更遵循“論從史出”的基本原則，重視新史料的發掘與運用，實事求是。最近二十年蔣介石相關資料層出不窮，也是學術進步的源泉與動力之一。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在經過一陣熱鬧與繁榮之後，冷靜分析近十多年來對蔣介石的學術研究，其存在的弱點已有所顯現：多數的研究集中於具體事件的個案，過於精緻瑣碎，缺少對蔣介石的整體研究，也缺少對蔣介石與中國社會關係的研究。楊天石教授的《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sup>①②③</sup>陳伯達：《人民公敵蔣介石》，第25、95、127頁。

<sup>④</sup> 2014年5月，南京師範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開發中心與人民出版社聯合召開“第二屆中國國家歷史高端論壇”，主題是討論將大學裏的“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拓展成“中國歷史”。

可以說是學術界公認研究蔣介石的代表作，由近二十篇論文構成，每篇就一個相關問題進行考證或糾偏，如抗日戰爭時期的六篇分別是：“九一八事變後的蔣介石——調整國內外政策的開端”、“蔣介石與1937年的淞滬、南京之戰”、“蔣介石親自掌控的對日秘密談判——日方誘和與蔣介石的應對及剎車”、“蔣介石對孔祥熙謀和活動的阻遏”、“論‘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與蔣介石‘抗戰到底’之‘底’——兼述蔣介石如何對待被日本侵佔的‘東三省’”、“蔣介石與史迪威事件——戰時中美之間的嚴重衝突”；他對於從整體研究與評價蔣介石的難度也有清醒的認識：“找尋真實的蔣介石，恢復其本來面目，正確評述其功過是非，給以準確的歷史定位，其事有相當難度，其時將不會很短，祇有群策群力，通過長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道路解決。”<sup>①</sup>這一目標的實現，當然需要更開放、更寬鬆的研究環境，但如果未來的研究仍陷在“碎片化”的泥沼中，學術進步就不會太大。因此，未來學術層面的蔣介石研究，一是要嚴格按照學術規範，發掘新史料，走“學術化”與“國際化”的路子，不能意氣用事地為迎合大眾“做翻案文章”；二是要將蔣介石置於中國近代社會的環境中加以考察，蔣的經歷也是大歷史中的小故事，不要孤立地評論他。

### (三) 公衆網絡層面的蔣介石

蔣介石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有重要影響的人物，民衆自然各有看法，套用那句“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那麼應該是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蔣介石了。原本缺乏表達工具的普通民衆，得益於互聯網的便利，有了表達的“自由”與陣地。蔣介石因而成為一些歷史類、政論類論壇的重要議題，各種評價紛呈，爭辯激烈。有的“擁蔣”的言論十分偏激，卻也引來“粉絲”的好評。有位歷史學教授說過一段經歷，他有次看到網絡上一些贊譽蔣介石的言論“十分出格”，與史實相去甚遠，就登錄上去傳播些“正確的知識”，結果遭到了“圍攻”甚至謾罵。

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B. Croce, 1866—1952）在寫下“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一著名論斷時，怎麼也不會想到日後會有一個所有網民都能充當“歷史學家”的網絡時代，對歷史的感悟與書寫已不再是“學者”的專利。其實，網民根據自己的知識背景與現實處境來從歷史中找資源，臧否歷史事件與人物，正體現了克羅齊論斷的精髓與對歷史解釋的“現代性”。網民眼中的“蔣介石”，就是他們認為真實的“蔣介石”，歷史學者似乎也無權橫加指摘。

對於以網絡為代表正在興起的社會公衆對蔣介石的“熱情”，歷史學研究者應該積極介入與引導。社會公衆畢竟缺少正規的史學訓練，很少接觸到基礎史料，他們感性、從衆，甚至衝動，但他們是社會的大多數。故學者不能再劃地為牢，孤芳自賞，應該在堅守基本史實的前提下，將最新的學術成果以公衆喜聞樂見的形式表達出來，如為報紙寫通俗文章，在文史類雜誌上開專欄，幫助廣播、電視製作專題類節目，到各地圖書館公開演講等，引導社會大眾，使他們得到正確的信息，形成較正確的歷史思維。這也是公衆史學所追求的目標。

簡而言之，在對歷史的解讀與表達已趨向多元的中國，研究歷史的理念與方法趨向多元，歷史學的社會功能也呈現多元。對“什麼是最好的歷史學”的追問，祇能針對不同層次，尋找不同的標準。

[陳紅民（1958—），男，山東省泰安市人，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所長、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教育部歷史學科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國家社科基金歷史學科評審組成員等，主要從事中國現代史、中華民國史及當代臺灣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函電裏的人際關係與政治：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胡漢民往來函電稿”研究》、《蔣介石的後半生》等。]

<sup>①</sup> 楊天石：“序”，《找尋真實的蔣介石》（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 “最好的歷史學”創造者們的共性

[加拿大]邱燕凌

(女王大學 歷史學系，加拿大 安大略 京士頓)



儘管歷史學研究者無法說清“好的歷史學”的評判標準是什麼，但也不能否認這些標準存在的可能性；而且，歷史學研究者在這個問題上並不孤獨，因為很多學科的研究者也無法準確地勾勒出他們學科的目標與界限。正像法國學者布魯諾·拉圖爾（B. Latour）所說的：

在某種特定學術領域中的專家們無法精確定義出他們所屬學科的內核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然而，當一個聰明的旁觀者對這些專家的工作成果進行仔細觀察後，反倒能確切理解其中內在的價值和方法。事實上，在定義某個學科的內核上，旁觀者往往

比局中人更能使人信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專家學者總是忍不住對與之相關的學科進行過多的論述，以示與這些近親同行區別開來，而一個有洞察力的旁觀者總是能避開這些包袱。

例如，對一個旁觀者來說，文學、歷史學與政治學研究者的論著都追隨相通的軌迹，通往類同的終點，並有着非常接近的讀者群；但這些研究者卻並不情願地宣稱他們有共通之處，而總是用“創造性的”、“觀念性的”、“具體性的”、“描述性的”、“經驗性的”、“解釋性的”、“敘述性的”等形容詞給自己或相近的同行貼上諸如此類的標簽。而實際上，這些努力都無助於準確描繪學科界限。例如，當我們要理解歷史學文章的內涵時，“經驗性的”和“理論性的”這兩種方法所界定的範圍，其實應該被忽略掉，以免造成誤導。在拉圖爾看來，觀察一個學科的核心實踐比調查這個學科理論上假定的界限更有啟發性。

通過對歷史學家的仔細觀察，可以發現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如何支配他們的時間總是成為他們相互交談及報告給觀察者的最主要的問題，但交談和報告的內容往往與實際是不相符的。比如，當被問及他們最近在做什麼時，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做研究，也有些人會談及一些細節——如何研究文獻、檔案，外出旅行搜集資料，對新材料的發現，甚至會告訴你，他的研究對理解歷史有什麼新的突破，等等。然而，當你仔細觀察一位成功的歷史學家到底在忙些什麼時，就會發現，他用於寫作的時間要比他做研究的時間多得多——相比之下，他對“寫作”而不是對“搜尋原始資料”更為着迷。祇要一有機會，他就會一次性花上許多小時、許多天、許多星期，甚至好幾個月來撰寫評論、論文或專著。作為寫作者，歷史學家會因此而忽視外在的世界，減少他們的社交活動，儘量不外出聚餐；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們甚至忽略對於做歷史學研究最重要、也是他們耗盡千辛萬苦搜集來的原始史料。即便他們被成堆的檔案資料和書籍包圍着，他們也仍然執著地緊盯他們發光的電腦熒屏——這個能使隱藏的歷史現象在文本中清晰顯示出來的百寶箱。歷史學家在這方面的表現實在令人難以理解，甚至連他們的家人也弄不懂他們到底在忙些什麼，而當被問及這個問題時，他們又總是含糊其辭：“是啊，這個真是沒辦法，不過要不了幾天我就弄完了。”

幸運的是，對於關注歷史學家的讀者來說，歷史學家長期的離群索居終究會拿出有形的成

① Bruno Latour, "Defining the Object of Inquiry", *An I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Chapter 1.

果——公開出版的論著。由此，讀者便可判斷這部著作是否達到了“最好的歷史學”的標準。如今，所謂成功的歷史學家，多是指他的論著被廣泛閱讀的歷史學家。這個評判標準已經被人們廣為接受並達成一致。例如，在我熟悉的領域裏，耶魯大學的史景遷（J. D. Spence）和加州大學的魏斐德（F. E. Wakeman, 1937—2006）的著作是傳播得最為廣泛的兩位學者，不僅被讀者，也被其他歷史學研究者認定他們是最優秀的歷史學家。他們的成功讓我認識到，是“寫作”而不是“做研究”成為他們成功的關鍵因素。事實上，一個做歷史研究的學者如果沒有作品是不能被稱為歷史學家的；這樣的學者尚未越過整理與說明原始資料來創造出歷史學作品階段。此外，如果一個歷史學家的著作沒有魅力，也是無法進入優秀學者的行列中的。無論一個歷史學家在他有開創性的研究中充滿了多少新的見解，如果不能進行充分有效的傳達，這項研究的社會價值將微乎其微。

由於寫作在歷史學創作中是如此的重要，年輕的史學工作者不僅要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研究者，同時也是一個寫作者。然而，這個注重寫作的建議對於那些選擇歷史學專業的大學生來說恐怕不太必要。大學的歷史課程通常要求學生進行大量的閱讀與寫作，而閱讀作為寫作者必需的訓練，恐怕更應該提醒那些年輕初入門的學者。

相關的調查同樣揭示出，一個有魅力的寫作者不僅僅是從實踐中錘煉而來，而且還需要極為大量的閱讀。成功的歷史學家在他們的閱讀體驗上總是保持沉默，正如他們在寫作上不願多談一樣。他們對某一本特定的歷史學著作會表現得非常健談，但他們很少願意描述自己的閱讀習慣，也不大願意談及為讀書癖好所付出的代價——雜亂不堪的辦公室，家裏遭書籍入侵以至於極度收縮的空間。歷史學家的讀書生活也是一個相當耗費時間的活動。事實上，就消耗時間而言，寫作和閱讀都比做研究在歷史學家的工作生命中來得更為顯著。隨之而來的結果便是，那些著名的歷史學家公開出版的作品顯然證明了這些作者是通過浸淫於文學中而掌握了寫作的藝術。不僅在歷史學上，在其他學科上亦存在這種現象。也虧了那些最好的歷史學家在文學上的浸淫，他們的寫作纔充滿了才華和與衆不同的風格。而獨特和吸引人的文筆又使他們的作品熠熠生輝，即使讀者早已忘記他們讀到的內容細節，卻仍舊對這些優秀作品帶來的愜意流連忘返。

在考察那些成功的歷史學家如何使用他們的時間時，還有一個更為奇怪的現象：他們投入到教學上的時間要多過任何其他事情。一方面，歷史學家們在相互交談中經常抱怨教學任務如何嚴重影響自己做研究；而且，如果被問到新作品的寫作進展時，也會表示教學很快就會結束，並計算這個學期還有多少天或多少節課。但另一方面，“學生”在優秀歷史學家的工作生涯中充當了最為重要的角色——如果出於某種原因，他們所在的學校停止招錄學生時，他們寧願選擇離開去往新的學校，也不會盡情放鬆來享受遠離教學的生活。因為教學幾乎跟寫作一樣，一個成功的歷史學家要學會如何在課堂上營造鼓舞人心的氛圍，在指導學生時不能表現出傲慢、賣弄學問或不耐煩等，尤其是在解釋歷史時要把學生當成相互合作的夥伴。他們知道，如果沒有學生，歷史學家的研究生涯，尤其是交流部分是不正常的，連續性是不夠的；如果沒有學生多種多樣的觀點來激發思考，歷史學家的生涯也是不完整的。

從這一點來說，教學是“最好的歷史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通過教學，歷史學家能學會向人們解釋他們的研究的意義所在，從而形成他們即將出版的書中要展現出來的敘述與論證。此外，通過教學，歷史學家也可以持續更新他們的意識：隨着更年輕的一代人透



史景遷的代表作之一

魏斐德的代表作之一

過時光的過濾鏡解讀歷史事件，這些歷史事件的意義總是在發生變化。儘管已經形成固定思想觀念的歷史學家會被這個世界不停變換的興趣所影響，也會相應地重新解讀過去的歷史，但他們更為老舊的心態與精神總是變化得更緩慢。如果他們不與這些對他們而言非常新的事物保持緊密聯繫，歷史學家會慢慢地失去向公眾傳達思想的能力。直白地說，是學生充當起教師的職責，來引導他們的老師意識到當下正在改變過去。

在歷史學不斷發展的今天，還有一個非常不尋常的現象，就是許多學生竟在向他們的教授傳授研究方法。當然，這個現象通常是以一種間接的方式呈現出來的。例如，有時候，一個教授會認為學生沒有經驗，還很懶惰，因為他們把在網絡上進行了兩分鐘的搜尋當成做研究，對那些電腦屏幕上雜亂無章的碎片式的小文的興趣多過閱讀最好的歷史學家的作品，他們甚至竟然不知道許多恢宏的圖書館資料及檔案文獻在網絡上是進不去的。然而，在另外某些時候，學生的某些研究方法卻推動教授重新認識了在線網絡資源的豐富性。通過這些方法，一個學生搜尋到了某些充滿疑問或令人深思的信息，一個教授則一不小心發現了一些有價值的資料或者一個完整的尚未被探索的信息世界，一個全新的可以使創作激情盡情綻放的區域。大部分諸如此類的課題很顯然應該被分派或建議給學生去探索的，因為已經形成穩定思想觀念的教授不會對那些衆多新的課題太感興趣，此外，在練習如何做研究並要與課程大綱融為一體時，經過指導被有效組織起來的網絡資料探索對學生來說助益匪淺。

教授經常從他們聘用的助研那裏直接學習如何做研究，能力強的學生會教他們如何通過網絡搜尋資料，如果教授能給予明確的問題和要求，他們將能靈巧地透過層層網絡平臺挖掘到那些非常有價值的史料。教授和學生助理都能從中獲益。一個學生如果有機會能幫助一個優秀的教授做研究恐怕比他做一年或更長的課程作業更有價值，因為這份工作可以使年輕學者學到如何形成一個研究性的問題，設計一個課題，闡釋研究成果，並在會議或出版物中展示自己的研究心得。我們知道，隨着這個世界的分工細化到被隔開至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及不同的人群中去時，古老的實習期便隱遁不現，而多虧教授工作的多面性特徵，一個學生助理還有機會體驗在當今世界已經消失了的實習期。然而，歷史學的見習期應該被限定在一段相當短的時間內。等到助研學到了足夠使他成為一個獨立研究者的經驗，並回報了雇主在訓練上的投資，作為回報他也幫助雇主學會如何使用網絡搜尋資料的研究方法，而且在經濟上不再依靠僱傭關係時，也就到了新助研上崗的時候了。

總的說來，年輕的學者如果想脫穎而出成為最好的歷史學家的話，應該仔細對待寫作、閱讀與教學。但如果缺少一個關鍵性因素——個人興趣，那仍將會制約他的成功。一個成功的歷史學家往往非常熱愛歷史學工作，能從其中各種不同的實踐活動中得到樂趣和滿足。而這也使得他們在具有開創性及革新精神的創作中永不停止地追尋，不斷地在創建一個個全新的學術領域。比如，歷史學家在過去曾建立了社會學、人類學，還有政治科學等領域，近些年來則又幫助建立了性別學、環境學等。可以說，最能從歷史學研究中獲得樂趣的歷史學家易於在自己的領域成為最具“奇理斯瑪”(charisma)特徵的領袖。他們的讀者被深深地迷住，他們的學生也受他們激發而靈感四射；同樣，“最好的歷史學”也總是為了更為廣泛的大眾的福祉而被創作。當然，與幸福的歷史學家走得更近的同事、朋友，還有家人也總是更幸福，儘管他們並沒有對歷史學家的歷史學研究細節表示多少關注。因此，到最後，如何從歷史學中獲取樂趣的問題似乎變得與如何創作“最好的歷史學”同樣重要了。（作者註：本文由劉明明翻譯）

[ 邱燕凌，女，康奈爾大學博士，斯坦福大學博士後，加拿大女王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代史及環境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Smokeless Sugar: The death of a provincial bureaucra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等。 ]

## 歷史的知識之光如何點亮

潘光哲

（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中國 臺北 11529）



1943年1月，經濟史名家全漢昇（1912—2001）曾以“皮倫”為筆名，對郭廷以（1904—1975）的《近代中國史》第二冊提出評論，說這部書“引用史料在本書中佔絕大部分，祇有一絕小部分纔是由編者用自己的話寫成的”，他認為：

在現今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仍舊停頓在開始階段的時候，史料的詳盡的搜集與徵引，自有其需要。可是，僅僅把一大堆史料排比一下，嚴格地說，這不能算是“近代中國史”，祇是“近代中國史料”而已。故我們還須要求編者更近一步地把這許多史料完全熔鑄過，然後用自己的話來寫成一本更好的近代中國史！<sup>①</sup>

不知道後來郭廷以對全漢昇的評論有何回應，但就郭廷以個人的認識而言，他基本上是同意羅家倫（1897—1969）研治中國近代史的見解的，“現在尚為史料整理編訂時期，而非史著寫著時期”，所以祇希望自己的這部書“能於史料之整輯排比方面，盡其相當力量”就够了，“絕不以歷史著作自承”。<sup>②</sup>其實，郭廷以太過“謙虛”了，他的這部書裏有不少有趣的論斷，需要讀者的細心品評。即如全漢昇雖然批評說這書祇是“近代中國史料”，他也看出來這一點。像郭廷以指稱，傳統上中國方面對於鴉片戰爭初期折衝樽俎的琦善（1790—1854）“大都極力指責詆斥，很少——亦可說絕無恕詞”；然而，在西洋的史家之外，“近來中國的史家也有人在作翻案了”，翻案者說“琦善知彼知己，深知中國非英之敵，應當委曲求全”。郭廷以認為，“要說琦善知己，容或差近情理，如說他‘知彼’，我不知道這種功夫是怎樣得來的”，因為“在他給皇帝的報告中，對於英國船堅砲利雖一再稱道，他自己始終沒有明確的認識”，琦善連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H. J. T. Palmerston, 1784—1865）給的照會，“這樣重要的文件竟不加以推敲注意，他如何能够‘知彼’？更說不上‘外交’了”。因此，琦善“極力主和，完全是受定海失陷的影響”，當他“看到定海的失陷，他看到烏爾恭額、祝廷彪的遭受撤懲，老於官場的琦善，自然要謀以自全之道”，所以他的“主撫完全是別有懷抱，說不上什麼‘知彼’功夫”。<sup>③</sup>全漢昇很贊賞郭廷以的論斷，並且把替琦善“作翻案”的歷史書寫聯繫時代背景來觀察：

九一八事變以後，盧溝橋事變爆發以前，中日妥協外交之說甚囂塵上，故論中國近代外交史者多贊成琦善的主“撫”外交。如今編者卻客觀地根據史實，對於此說一一加以駁斥，其在中國外交史研究上的貢獻是值得表彰的。

熟悉中國近代史研究成果的讀者都知道，幫琦善“作翻案”的正是蔣廷黻（1895—1965）。他於1931年發表在《清華學報》第3期的《琦善與鴉片戰爭》，稱譽琦善“審察中外強弱的形勢和權衡利害的輕重，遠在時人之上”；相對的，在蔣看來，嚮往被視為英雄的

① 皮倫：“新書介紹：《近代中國史》第二冊（郭廷以編）”，《圖書月刊》6（1943，重慶）：39—41。

② 郭廷以：“例言”，《近代中國史》（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第1冊，第1頁。

③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第2冊，第256—257、266頁。

林則徐（1785—1850），對於“中外的形勢，實不及琦善那樣的明白”。這與既有的評論確實大不相同。蔣廷黻的論述出世後，便碰到了持異見者<sup>①</sup>，郭廷以對此等論斷也早有不同意見<sup>②</sup>。蔣廷黻與郭廷以（或是其他學人）對於琦善和林則徐的形象如何重塑再造並不重要，他們都有可以支持自己論斷的史料。有趣的是全漢昇對蔣廷黻“作翻案”的時代背景的省思。回觀蔣廷黻的議論，他提出“外交史研究”不可違反“歷史學”的“紀律”，“這紀律的初步就是注重歷史的資料”，因此他主張“研究歷史者必須從原料下手”。<sup>③</sup>但是，因為外交史的“國際性質”，是故“研究外交史者必須搜集有關係的國家各方面的正式公文和私人記錄。專憑一國的文件來撰外交史，等於專聽一面之詞來判訟：這是絕不能得其平，得其實的”<sup>④</sup>所以，蔣廷黻強烈批判“外交史可以隨便撰著”，“著者可以不用史料，即有史料亦不必審查和分析”，把“宣傳”和“研究歷史”混合為一的學術風氣。在他看來：

現在國人所需要的，與其說是宣傳品所能供給的感情之熱，不若說是歷史所能供給的知識之光。<sup>⑤</sup>

他本人確實從學術上以身作則，要點亮“歷史的知識之光”。祇是，僅就蔣廷黻與郭廷以對琦善地位的不同評價/論說而言，哪位史學家纔是為人們點亮了“歷史的知識之光”呢？從我們今天的認識來說，對於琦善歷史形象的“再現”（representation）是否真實無誤，已經不再是歷史這一個行業的從業人員當下



蔣廷黻

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	
目錄	
第一章	鴉片戰爭
第一節	前中英兩國及邦交之演變
第二節	煙禁之加劇
第三節	林則徐抗制之鴉片戰爭
第四節	琦善時期之鴉片戰爭
第五節	南京條約之續定
第二章	伊里布耆英之接續政策
第一節	中英商約
第二節	中美商約
第三節	中法商約
第四節	印度及香港之收復

《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目錄

的共同樂觀/信念了，史學知識生產方式受到劇烈的動搖。因此，纔會有史家聲言：“古代史研究者一向看重史料辨偽，這一風氣在近代史領域尚不够流行……似應得到進一步的重視和更有力的提倡。”<sup>⑥</sup>好似呼應着羅家倫當年詳慎考訂史料、編訂“史料叢書”的主張（當然，其他前輩名流學人類似主張者多矣，不贅述）。可是，史料的搜集、編輯與考證，怎麼可能會是史家在（知識/視野/世界觀……）“真空透明”的環境/情境下做出的事業呢？

例如，史家在批閱馬士（H. B. Morse, 1855—1934）的《中華帝國的國際關係》（*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找尋他整理過的（英國）史料的時候，大概總難免會受到他歷史敘述架構的影響，他將“中國近代的發展”區分成三個時期：第一期為“中外衝突時期”（1834—1860），第二期為“中國屈從時期”（1860—1894），第三期為“中國服屬時期”（1894—1911）。<sup>⑦</sup>觀乎後繼者的分期觀點，雖自成匠心，然“萬變不立其宗”。羅家倫基本上也持同樣的論點，再細分為四個段落：“衝突時期”（1834—1860）、“屈伏時期”（1861—1895）、“乞憐時期”（1896—1919）、“國民革命時期”〔1920至現在（即1929）〕；<sup>⑧</sup>武漢大學歷史系於1928年開設的“中國外交史”課程裏，將馬士著作列為參考書之一的授課者，則將1516年中西航路大通至1930年代之中國外交史分為

① 陶元珍：“讀‘琦善與鴉片戰爭’”，《大公報·圖書副刊》，1935-05-02。

② 郭廷以：“姚薇元《鴉片戰爭史事考》序”，姚薇元：《鴉片戰爭史實考》（貴陽：文通書局，1942）。

③ 蔣廷黻：“《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自序”，《蔣廷黻選集》（台北：文星書店，1965），第1冊，第45—47頁。

④ 蔣廷黻：“《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清華週刊》9—10（1932）：997。

⑤ 蔣廷黻：“外交史與外交史料”，《大公報文學副刊》，1932-10-10。

⑥ 羅志田：“見之於行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論與表述”，《近代中國史學十論》，第244頁；當然，他對“史料辨偽”的看法，尚有申論，不詳引述。

⑦ 這是參照郭斌佳的整理〔郭斌佳：“紀念馬丁與摩斯二先生”，《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2（1934）：392—393〕。

⑧ 羅家倫：“對於中國近代史應有的認識”，《新晨報·學匯》，1929-01-16。

四期：（一）1516年葡萄牙人東來至1793年馬戛爾尼（G. Macartney, 1737—1806）使華為止；（二）近代中國外交史之背景（1793—1860年英法聯軍入北京），注重此衝突時期內喪失之國權；（三）1860—1918年歐戰終止，講述此屈伏時期內國權之繼續喪失；（四）討論此時期內國權之收復（1902年《馬凱條約》至最近），<sup>①</sup>其實祇是對馬士敘史架構的“精緻化”。站在“後殖民”立場的批評者，應該可以從這裏又找到一則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史學家如何與帝國主義“共謀”的例子了。

況且，讓史學家耗神費心於史料工作，不能忘記知識生產的“政治經濟學”，它需要現實經濟條件/處境的保障。能得到學術體制支持的，可以放手大膽做去，湯象龍（1909—1998）請助手幫忙抄寫故宮檔案，每日請書記三十人，費用總計約需三萬元左右，便有賴於他任職的北平社會調查所所長陶孟和（1887—1960）之支持；<sup>②</sup>羅家倫擔任清華大學校長時，把蔣廷黻從南開大學挖過來，等羅家倫離職之後，“人去政息”，讓蔣廷黻感嘆曰因為“校局不定”，所以打算出版史料叢書的計劃“惟有暫時擱置，其他擴充計劃，一時亦難提及”。<sup>③</sup>而在學術單位裏的，像簡又文（1896—1978）是立法委員（1933年起任斯職），可以讓他不必擔心經濟問題，專治太平天國史而不輟，到上海《字林西報》社去翻閱《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找史料，還可以請人幫忙打字整理找到的材料。<sup>④</sup>但不在學術單位，沒有經濟資源的，祇好把目光朝向出版市場。蓋當時出版界出版歷史（近代史）著作或資料，絕非無利可圖。例如，在中華書局工作的左舜生（1893—1969）編輯《中國近百年史資料》於1926年出版後，顯然頗受歡迎，於是又出版了《續編》<sup>⑤</sup>，而這套書確實有便於學界徵引<sup>⑥</sup>。羅家倫對此早就有獨到的眼光，他寫信給張元濟（1867—1959）報告自己的志向時，主張編輯一種“近百年史料叢刊”，便指出：“此種出版品如編輯得當，並可有很好銷路；尤其是近百年事，其中有趣者太多，而且大家又願意知道。”<sup>⑦</sup>顯然，他沒有忘記，作為商務印書館首腦的張元濟，既是學者，也是生意人。後來，史語所編輯的《明清史料》可以再行出版，即全賴商務印書館之力。<sup>⑧</sup>至於一般寒素學人，在文化/出版市場上也有立足之地，像羅爾綱（1901—1997）雖然在北京大學任職，所得卻是微薄之至，研究太平天國的成果，即可以換取稿費，如他完成《洪大泉考》一文後，估計可得一百多元的稿費，幾乎等於他兩個月的薪資；他那部廣受好評的《太平天國史綱》也是“著書都為稻粱謀”的作品。<sup>⑨</sup>他會在報刊上發表不少的史料介紹之作，想來也是基於同樣的理由。羅爾綱的努力，利己利人，簡又文就說他整理的史料，有助於自己的研究寫作。<sup>⑩</sup>

出版/報刊界方面，顯然也將史料視為可以吸引讀者的內容/主題，像《國聞週報》這樣的大型報刊上（長期刊登徐一士這樣的名家撰述的掌故文章以外）更屢屢刊登史料，甚

<sup>①</sup> 國立武漢大學：《國立武漢大學一覽1930—1931》，民國19年，第51—57頁〔劉龍心：“中國近代史：一門次學科領域的興起”，《“史學·時代·世變：郭廷以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2004-01-13），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第18頁（註70）〕。

<sup>②</sup> “湯象龍致羅家倫函（1930年12月12日）”，《羅家倫先生文存附編——師友函札》（台北：編者印行，1996），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第286—287頁。

<sup>③</sup> “蔣廷黻致羅家倫函（1932年9月26日）”，《羅家倫先生文存附編——師友函札》，第335頁。

<sup>④</sup> 簡又文：《太平軍廣西首義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第42、45頁。

<sup>⑤</sup> 左舜生先後編撰了《中國近百年史資料》（上海：中華書局，1926）、《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上海：中華書局，1933）〔陳正茂：《左舜生年譜》（臺北：國史館，1998），第70、95頁〕。

<sup>⑥</sup> 如張蔭麟撰“甲午中國海軍戰績考”，引用羅惇鈞的“中日兵事本末”一文，即用左舜生編的《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的版本〔張蔭麟：“甲午中國海軍戰績考”，《清華學報》1（1935）：82（註44）〕；蓋羅惇鈞此文原刊《庸言》5（1913），在1930年代的圖書館未必看得到。

<sup>⑦</sup> “羅家倫致張元濟（菊生）函（1925年5月25日）”，《羅家倫先生文存附編——師友函札》，第52頁。

<sup>⑧</sup> 傅斯年：“明清史料復刊誌（1936年1月撰）”，《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第4冊，第360頁。

<sup>⑨</sup> 潘光哲：“胡適與羅爾綱”，《文史哲學報》42（1995，台灣大學）：77。

<sup>⑩</sup> 簡又文說，羅爾綱錄寄之倉景恬遺著，對他述說太平軍“圍攻長沙一節……得獲補充資料不少”〔《大風》83（1941，香港）：2759〕。



至於還懂得找“學者專家”背書，如“淮安宋默先生”家藏其先人“輾轉搜羅”而得的關於鴉片戰爭之文獻，投寄《國聞週報》，編者便先與已出版的史料集（如《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等）相覈，發現即有“外間未見而又饒有價值者”，但因“編者未敢率爾自信”，所以便邀請“近代史專家蔣廷黻先生校閱簽註”，確實“發現新史料七十餘件，頗有不少新知識貢獻”，於是開始長期連載，還特別警告說“此項史料，宋君保留版權，讀者可研究引用，不得翻印”（由此警告，當可推想當時的文化/出版市場上，一定存在着各式各樣的“海盜版史料”）。<sup>①</sup>從讀者會提出意見的情況來看，刊佈這些史料，確實不失為足可招攬顧客的“生意經”。如任鼐見得《國聞週報》刊登“淮安宋默先生”提供的史料，即有迴響，特撰《“京口債城錄”所紀壬寅兵事》說這是敘述1842年英軍進攻鎮江事的史料，唯作者“隱園居士”不知何人。祇是，他的反應見諸《逸經》，而非《國聞週報》，原因為何，不得而詳。<sup>②</sup>同樣在別的刊物上出現對《國聞週報》的回應的另一例子，是由張蔭麟（1905—1942）引起的。張蔭麟在《國聞週報》發表介紹《水窗春嘵》這份史料的文章，指出其價值甚高，有助於瞭解曾國藩（1811—1872）的人格真相，如其中述說曾國藩殺李金暘一事，便可見“文正手段之辣，有如此者”，他還特別商請其友李鼎芳撰寫考證是書作者的文章。<sup>③</sup>陶元珍（1908—1980）讀了此文後，即有所回應，他從曾國藩的奏疏、日記及書札裏勾勒其情，謂“金暘戮實當其辜，不得謂文正殘酷也”，反駁了張蔭麟的意見，且補充說，《水窗春嘵》非珍稀秘本，譚獻於光緒十年即已閱是書矣。祇是，他的反應何以見諸天津《益世報》而非《國聞週報》，也是不可解的謎題了。<sup>④</sup>對近代史（與史料）有興趣的潛在讀者群，顯然雄厚非常，讓報刊/出版商願意“投資”於斯。

史料的抉擇，更與史學工作者的“史識”脫離不了關係。用“現代”眼光來看前人，等於是戴上曲光眼鏡，用“非歷史主義”的視野，批判前行者之所言所為所思。如聲言“史料經過學者研究，辨別虛實，始有真確可信之史績，然後方有滿意可讀近代世【史？】之著作”<sup>⑤</sup>的陳恭祿（1900—1966），便是一例。他批評陳熾（1855—1900）所謂“摩西者，墨翟之轉音也；出埃及者，避秦之事也”的“想象”，是“陳氏不可思議之妙論，直為癡人說夢”<sup>⑥</sup>，卻不會思索陳熾等人是在“中學”、“西學”之間的取擇，如何苦心調節。陳恭祿在檢討“近代中國史史料”的時候，又批評江上蹇叟（夏燮，1800—1875）的《中西紀事》與芍塘居士（王之春，1842—1906）的《海防紀略》，“均言道咸同朝之外交，其敘述戰爭，及善後問題，錯謬幾觸目皆是。《中西紀事》詳言教士取室女紅丸，及用眼睛煉銀，直為癡人說夢”，而“《海防紀略》誇張三元里義民動舉，謂殺英將伯麥，頭大如笆斗，直為笑談”<sup>⑦</sup>，對此二書大有不屑之意味。對比之下，還未改行當考古學家的夏鼐（1910—1985），本來以治近代史為專業<sup>⑧</sup>，他對這兩部書的記述，則別有新見，評論說鴉片戰爭時人民嘲罵奕山（1790—1878）、奕經（1791—1853）等將官的怯懦，而歌頌廣州平英團、廈門民團的英勇，這些資料散見於《中西紀事》、《防海紀略》等書，這些記載“多得諸傳聞，故常失實，但正可以表示當時人民心目中民團的英武與官

① 淮安笑虹宋默（藏），國聞週報社（選）：“鴉片戰爭新史料”，《國聞週報》46（1933）：1。

② 任鼐，“《京口債城錄》所紀壬寅兵事（附編者跋）”，《逸經》2（1936）：15—17；又，《逸經》編者（應為簡又文？）曰，其藏有丹徒陶氏刊本之《京口掌故叢編》，內即附《京口債城錄》，作者署名“國朝法芝瑞撰”。

③ 張蔭麟：“跋《水窗春嘵》（記曾國藩之真相）”；李鼎芳：“附錄：《水窗春嘵》作者考”，《國聞週報》10（1935）。

④ 陶元珍：“關於《水窗春嘵》（附考曾文正戮李金暘事）”，《益世報·讀書週刊》，1937-06-17；按，所謂譚獻曾閱《水窗春嘵》（譚獻：《復堂日記補錄》，總153頁）。

⑤⑦ 陳恭祿：“近代中國史史料評論”，《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3（1933）：549、542。

⑥ 陳恭祿：“甲午戰後庚子亂前中國變法運動之研究”，《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1（1933）：67—68。

⑧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第70頁。

兵的無力”<sup>①</sup>，以這樣“辯證”的態度對待舊籍，確實較陳恭祿可取。陳恭祿的視野，更可能祇放在政治領域，所以說“李慈銘、王闔運日記爲吾人習見之書，其人未有參與國政之機會，殊無討論之必要。他如葉昌熾之《緣督廬日記抄》、李棠階之《李文清公手書日記》，一則所記多爲見聞，一則偏重講學，亦無舉例之需要”。祇有《梁濟日記》（收入其子梁漱溟編輯的《桂林梁先生遺書》），纔有價值，蓋“頗足以見中日戰時京中不安之情狀”也<sup>②</sup>。相較於同輩的羅家倫稱許“最近商務印行之翁叔平日記、李越縵日記、其中多可批檢，爲最好史料<sup>③</sup>，乃至於晚輩的吳相湘（1912—2007）之進行“辛酉政變”研究，李慈銘（1830—1895）的日記即爲其取材來源，陳恭祿的史家技藝，確實有可議之處。<sup>④</sup>

英國文化研究巨匠霍加特（R. Hoggart）的名著《識字之用》（*The Uses of Literacy*）對青年一代沉迷於漫畫，憂心忡忡；然而，它在通俗文化裏確實佔有一席之地，自然也該成爲歷史研究的對象。2001年4月，台灣的中國近代史學會在時任理事長呂芳上教授的倡議下，舉辦了“漫畫中的歷史・歷史中的漫畫”研討會，討論了“漫畫世界”的歷史圖像。好比說，在第二次中日戰爭的歷程裏，出入於虛構和現實之間，漫畫如何成爲打造“國族想象”的一種工具？<sup>⑤</sup>在此之前模造近代史知識的生產方式的前行勞動者，像顧頡剛（1893—1980）那樣知道要把（包括“記載性的圖畫”在內）的“舊藝術書”納入“購求中國圖書計劃”的<sup>⑥</sup>，卻大概不多。兩相比對，具體顯現了時代的變遷及視野的擴張對歷史研究的影響。本來，就像追問愷撒（J. César, 前102—前44）渡過盧比孔河（the Rubicon river）的意義，與其他成千上萬的人同樣渡過這條河，究竟有什麼不同一般<sup>⑦</sup>，過往的歷史舞臺上有哪些問題值得追問求索，自然也沒有標準杆尺，怎樣詮解其意涵，也沒有標準答案，都是史學工作者自己選擇的結果。可是，天地之間，足可制約史學工作者的現實精神/物質條件，不知凡幾。況且，史學家本人及其著作，是他在世間爲人知曉的“兩種身體樣態”（historian's two bodies）；不過，史學家的工作業績一旦問世，會引發何等的迴響，無可料知。這兩個身體之間的衝突矛盾或曖昧，無時或已。<sup>⑧</sup>可以說，蔣廷黻冀望的“歷史的知識之光”，固然理想崇偉，卻必然祇會是“高貴的夢想”（that noble dream）<sup>⑨</sup>而已。

〔潘光哲（1965—），男，出生於中國臺北市，2000年獲得台灣大學歷史學博士学位，現爲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晚清史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華盛頓在中國：製作“國父”》、《“天方夜譚”中研院：現代學術社群史話》等。〕

① 夏鼐：“太平天國前後長江各省之田賦問題”，《清華學報》2（1935）：426（註62）。

② 陳恭祿：“近代中國史史料評論”，《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3（1933）：539。

③ “羅家倫致張元濟（菊生）函（1925年5月25日）”，《羅家倫先生文存附編——師友函札》，第52頁。

④ 趙豐田就批評過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說他欠缺文史訓練，撰述亦不夠細心，故其著並不可靠（Feng-t'ien Chao（趙豐田），“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Works on 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1（1940）：84）。

⑤ 參見《近代中國》134（臺北，2001）。

⑥ 顧頡剛：“購求中國圖書計劃書”，《文獻》（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1），第8輯，第24頁。

⑦ 這當然是承襲卡爾（E. H. Carr）的論說，參見[英]愛德華·霍列特·卡爾：《何謂歷史？》（臺北：博雅書屋，2009），江政寬譯，第106頁。

⑧ Nathan Uglow, *The Historian's Two Bodies: The Reception of Historical Texts in France, 1701–1790* (Aldershot and Burlington: Ashgate, 2001)。

⑨ 此語套用自彼得·諾維克〔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